

两篇匿名文章引发的文学争论

——从“双簧信事件”到“金梁合论事件”

王宗辉

(苏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 “五四”新文学兴起之际并未瞬间取得文坛的主导地位, 彼时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仍是文坛的庞然大物。为声援文学革命、争夺文学话语权, 匿名的“双簧信事件”应势而出。将近半个世纪之后, 因匿名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而引发的“金梁合论事件”, 再一次呼应了“双簧信事件”的隐喻性主题。就前后两次发生在不同语境中的文学争论的历史背景而言, 看似缺少一套共同的叙事话语, 实则形异实同, 争论的焦点仍旧在于如何定位或书写通俗文学。

关键词: 双簧信; 金庸梁羽生合论; 通俗文学; 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390(2021)03-0061-05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产生社会效应的文学争论并不少见, 值得深思的问题是, 由“谁”做了“什么”而引发了这些文学争论。以“双簧信事件”和“金梁合论事件”为例, 这个“谁”只是当事人的化名, 而化名具有匿名色彩, 他可能要被隐藏很久之后, 才会被熟悉内幕的人披露出来。至于制造这两次文学争论的“谁”, 便经过了这样一个由匿名状态到为人所知的阶段, 也因之显示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历史渊源与矛盾纠葛。在前后相异的历史语境中, 推手的匿名状态恰恰证明, 无论是为新文学正名, 还是为通俗文学正名, 均不可能一蹴而就, 甚至要自诩其面。尤其当涉及通俗文学的批评标准时, 参与文学争论的人更是难有持平之论, 以至于汤哲声在分析个中原因时说: “他们对‘五四’新文化对‘鸳鸯蝴蝶派’的批评缺少科学的态度, 并没有真正了解‘五四’新文化对‘鸳鸯蝴蝶派’批评的必要性和历史意义, 并没有看到‘五四’新文学为夺取中国文学正宗地位所采用的那些矫枉过正做法的合理性。”^[1]

一、对峙: 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话语博弈

钱理群等指出: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相辅的文学革命的兴起, 是相当激进的。新文学一开始站

在弱势地位与庞大的旧文学对抗, 也无法与有了一点‘现代性’趋向的市民通俗文学共处。这样就有了新文学阵营从1917年开始的持续批判‘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的行动。”^[2] “双簧信事件”同样是新文学阵营采取的批判行动之一, 指的是刘半农、钱玄同为了给新文学造势而自导自演的一场双簧戏。具体表演手段为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给《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写信, 题名就叫《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 作为既定合伙人的刘半农, 便回敬了《复王敬轩书》一文。这两篇“唱和”文章, 同时刊登于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3号, 并一起被编排在《文学革命之反响》的总标题之下。其中, 《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以文言文写就, 在信中王敬轩不仅细数了新文学的种种罪状, 而且罗列出社会上反对新文学的各种论调, 意图将新文学扼杀在摇篮之中。署名记者半农的《复王敬轩书》, 则对王敬轩种种不合时宜的论调做了逐一批驳, 强调提倡新文学乃大势所趋, 守旧势力终将被一一廓清。

起初, “双簧信事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 守旧势力对之不闻不顾。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在于, 此时新文学的力量还比较薄弱, 根本不具备同当时作为庞然大物的通俗文学相抗衡的力量。后来, 随着鲁迅、周作人等的加入, 无论是新文学的理论倡导, 还是新文学的创作实践, 才逐渐成熟并壮

收稿日期: 2020-12-01

作者简介: 王宗辉,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

大起来。新文学迅速成长的势头,给守旧势力造成了巨大恐慌。为捍卫自身既得利益,他们再也无法保持沉默。最终,在胡适、陈独秀相继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之后,先前写下《论古文之不宜废》的林纾再次被激怒了。他写了名为《荆生》和《妖梦》的小说,含沙射影地讥嘲提倡新文学的一群人。于是,一场新旧文学之间的话语博弈,因林纾的出头而变得煊赫起来。

在社会转型之际发生的“双簧信事件”,是刘半农、钱玄同精心设计的一场请君入瓮的好戏,争夺的乃是新文学自身言说权利的合法性或正宗性。由于当时执文坛牛耳的是鸳鸯蝴蝶派等通俗文学作家,因此新文学作家认为只有将斗争的矛头对准这些旧式的传统文人,新文学才能牢牢掌握文坛的话语权。在他们看来,鸳鸯蝴蝶派文学格调不高,已经落在了时代后面,必须革故鼎新。例如,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中指出“现代的中国小说,还是多用旧形式者,就是作者对于文学和人生,还是旧思想;旧形式,不相抵触的缘故。作者对于小说,不是当他作闲书,便当作教训讽刺的器具,报私怨的家伙。至于对着人生这个问题,大抵毫无意见,或未曾想到。所以做来做去,仍在这旧圈子里转;好的学了点《儒林外史》,坏的就像了《野叟曝言》,此外还有《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聊斋》派的某生者体,那可更古旧得厉害,好像跳出在现代的空气以外,且可不必论他。”^[3]再者,“双簧信事件”也是一次类似制作话题进行炒作的舆论行为,其对准的是社会上如古文的坚守者等守旧势力或者传统卫道士。即是说,刘半农、钱玄同想把与新文学对立的一方迫不及待地拉入论战的漩涡,从而确立“五四”新文学的话语权威。但两人的精心布局或者“出此下策”,既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又与他们所标榜的新文学主张不相匹配,甚至倡导文学革命的急先锋胡适,也觉得这种做法不够光明磊落。比如,当胡适向任鸿隽透露双簧信的内幕之后,任鸿隽吃惊不已“王敬轩之信,隽不信为伪造者。一以为‘君等无暇作此’。二则以为为保《新青年》信用计,亦不宜出此。莎菲[陈衡哲]曾云此为对外军略,似亦无妨。然使外间知《新青年》中之来信有伪造者,其后即有真正好信,谁复信之?又君等文字之价值虽能如旧,而信用必且因之减省,此可为改良文学前途危者也(隽已诫经农、莎菲勿张扬其事)。”^[4]

“双簧信事件”在社会上酿成文学争论的气氛之后,林纾等反对新文学的异己力量逐渐受到压制。在随后与“学衡派”和“甲寅派”展开的争论中,新文学作家看似无坚不摧、所向披靡,却也可能是一种具

有偏向性的胜利。毕竟,类似鸳鸯蝴蝶派的通俗文学,仍旧牢牢把握着广大市民读者群,这便充分显示出中国通俗文学的特性所在。正如张赣生在《民国通俗小说论稿》一书中所说“中国的通俗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在于中国通俗小说的内容广泛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也不仅在于中国通俗小说的艺术表达方式具有鲜明的特色,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个性,更主要的是中国通俗小说渗透在中国人千百年来生活当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5]相反,新文学的读者群却基本限定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传播范围显得较为逼仄,这便无形暴露出新文学初登文坛之际的尴尬处境。瞿秋白在《吉诃德的时代》一文中指出:“事实上所谓新文学——以及‘五四式’的一切种种新体白话书,至多的充其量的销路只有两万。例外是很少的。”^[6]究其原因在于两者的运作方式不尽相同,如孙金燕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新文学和通俗文学的运作方式有很大不同:一方主要在学院内,一方在出版界。”^[7]即是说,新文学作家虽然以启蒙者的姿态把广大市民当作启蒙的对象,却又偏偏采取学院化或精英化的书写方式,导致他们的文学创作与启蒙对象的实际处境相去甚远。通俗文学却与书局、报刊社等现代出版机构紧密相连,一方面号准了广大市民的脉搏,另一方面推出了切合他们阅读品位的文学作品,从而占据了大面积的读者市场。如此一来,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话语博弈,便在文学的生产机制或运作方式方面烙下了深刻的印痕。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指出“诗文在中国古代是处于文学结构中心的高雅形式,而白话小说则是正统的士大夫所不屑一顾的‘通俗文学’。”^[8]他还提到,虽然两者具有文学形式的高雅与通俗之分,却没有文学种类的高低贵贱之别,并且还在相互撞击之中形成了互相补充、互相借鉴的一面。诚如斯言,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话语博弈,也处于这样一种既竞争又融合的状态。

二、内证:金梁如何定位通俗文学的存在状态

为行文方便,姑且将因梁羽生化名佟硕之所写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而引起的争论,拟定为“金梁合论事件”。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中国港台新派武侠小说蓬勃发展的时期,一份报纸的生死存亡有时便系于一部武侠小说的连载。对此,金庸曾不无自诩意味地说“我本来写小说是为报纸服务,希望报纸成功。现在报纸的事业好像容易过去,

而小说的影响时间比较长,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成果。”^[9]彼时刚刚在香港创刊的《海光文艺》,自然也想得一个头彩。鉴于当时读者对于武侠小说如痴如醉,以及涌现出金庸、梁羽生两位武侠小说大师的社会情境,既是《海光文艺》策划人,又是金、梁两人朋友的罗孚,便想借此大做文章。“在当时,我们是把武侠小说常做通俗文学看待的……为了适应读者的兴趣,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们决定发表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的文章,谈论新派武侠小说在他们勇闯直前下地发扬光大。”^{[10]37-38}为大做文章,罗孚首先说服梁羽生写一篇关于武侠小说的评论性文字,但梁羽生不想用自己的名字去写,罗孚便向梁羽生保证绝不会泄露作者的真实身份。于是,梁羽生便化名佟硕之写下《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分别连载于1966年的《海光文艺》创刊号和第二、三期上。然后,罗孚又邀请金庸对佟硕之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做出回应。“合论发表后,我请金庸写一篇回应的文章,也希望他能长枪大戟,长篇大论。他婉转拒绝了,但还是写了一篇两千字左右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登在第四期的《海光文艺》上。”^{[10]40}

在《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中,梁羽生既提及了“新派武侠小说”的生成“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他们的小说在写作手法、内容意境上都颇有推陈出新之处,一般人称之为‘新派武侠小说’(包括受他们影响的诸家作品)。”^{[11]214}又解释了“金梁”的排序问题“若按‘出道’的先后来讲,应是先梁后金,但‘梁金’读来不如‘金梁’之顺口。”^{[11]242}也评说了两人不同之处“梁羽生的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11]242}还指出了金庸的一些错误“宋人不能唱元曲,这是常识问题,金庸决不会不知道。”^{[11]251}并说“就整部小说的情节安排而论,金胜于梁;就爱情描写的变化多样而论,金不如梁。”^{[11]264}为掩饰身份,他又故布迷雾“金庸、梁羽生都是我的朋友,或至少曾经是我比较接近的朋友。他们本来都没有打算写武侠小说的,后来之所以作此尝试,至少部分出于我的怂恿。”^{[11]269}

对于如何评价武侠小说这一类通俗文学,梁羽生说“我不反对武侠小说,我也不特别提倡武侠小说。此时此地,看看武侠小说作为消遣应该无可厚非。若有艺术性较高的武侠小说出现,更值得欢迎。但由于武侠小说受到它本身形式的束缚,我对它的艺术性不抱过高期望。”^{[11]269}在《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一文中,金庸除了自陈个人写作武侠小说只

是想为读者提供娱乐,还明确指出梁羽生才是那一个抱着严肃目的进行武侠小说创作的文艺工作者。对于金庸在《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一文中的说法,梁羽生似乎不太认可。于是,他在《海光文艺》第五期又写下《著书都为稻粱谋》一文进行回应,认为金庸给他冠以文艺工作者的头衔,并说他以小说来灌输一种思想,实在与事实相悖。然后,梁羽生又把这种灌输思想的写作方式抛给金庸,并提及金庸在一篇名为《谈批评武侠小说的标准》的文章中,认为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的第一个标准便是主题思想。对此,金庸指出“我写的武侠小说并没有想宣扬什么主题思想,偶然也有一些对社会上丑恶现象与丑恶人物的刻画与讽刺,然而那只是兴之所至的随意发挥。”^[12]又说“我不赞成用‘主题’来评判一部作品。主题的正确与否,并不是文学的功能,如果要表现一种特定的主义,写一篇理论性文章会更好、更直接……”^{[11]51}似此前后相悖的言论或批评标准,似乎显示出作为从事武侠小说创作的通俗文学作家自身的一种诡辩色彩。

具体到此次“金梁合论事件”争论的焦点,仍旧在于如何认识以武侠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这便在某种程度上与“双簧信事件”隐喻的主题遥相呼应,只不过以内讧的形式——笔战——出之。双簧戏是一种民间艺术,须由两个演员合作完成,一人在前用形体表演,一人在后用声音说唱,给观众造成一种前面演员自演自唱的错觉。在“金梁合论事件”中,梁羽生化名佟硕之,既评价梁羽生,又评价金庸,完全是一次自我独奏,金庸似乎被蒙在了鼓里。即便金庸所写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最初也只是回应佟硕之,并没有把梁羽生作为预料中的争论对手,但在所写文章中又难免提及梁羽生,并提出一些略带意气性口吻的批评意见。如此一来,谁是佟硕之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金、梁之间关于以武侠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存在状态的争论,已经被煽动起来。尽管昙花一现,却又是时势使然。需要指出的是,金庸与梁羽生对于武侠小说的认识,非但没有达成一致,反而因社会语境的更迭而染上了变异色彩,就如那些留存于世却又构成一种悖论的言论或批评标准。关于梁羽生才是《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真正作者的秘密,直到罗孚在1988年第3期《读书》杂志发表《侠影下的梁羽生》一文中才公之于众,却又引发了世人对于梁羽生的诘难。为此,罗孚不无置气地说“梁羽生并没有要借金庸抬高自己,我们的《海光文艺》倒是有这个‘阴谋’的。那些嘲骂梁羽生的人,其实应该掉过头来,骂《海光文艺》才是。”^{[10]40}

三、匿名:不同历史语境之中的主体策略选择

从1918年的“双簧信事件”到1966年的“金梁合论事件”,前后相隔近半个世纪,从表面上看这两次文学争论的情形不尽相同,如时代背景、参与者、影响等。从争论的背景看,“双簧信事件”发生之际,鸳鸯蝴蝶派式的通俗文学的力量还比较雄厚,新文学并不能够独霸天下。为了制造声势,新文学作家便以他们为竞争对手,以期在争论之中证实新文学的话语权威。“金梁合论事件”发生之际,并没有指定的对手,只是想引起关于武侠小说的争论,并借机扩大《海光文艺》的销售市场。从争论的参与者看,“双簧信事件”主要发生在新旧两个彼此对立的文学阵营之间,一方为接受西式思想洗礼的新文学代表人物,另一方为与新文学唱对台戏的旧式传统文人。“金梁合论事件”的参与者,仅限于金庸与梁羽生,更应该看作以武侠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的内部纷争。从争论的影响看,“双簧信事件”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展开起了先声夺人的作用。“金梁合论事件”既涉及金庸、梁羽生武侠小说的优缺点问题,也涉及两人武侠小说创作水平孰高孰低的问题。这种颇具社会效应的文学争论,不仅提高了广大读者阅读武侠小说的热情,而且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尽管这两次文学争论有以上种种不同,但也有一套共同的叙事话语,即如何定位或书写通俗文学。“双簧信事件”侧重的是新文学语境中如何定位或书写通俗文学。新文学初始之际,通俗文学因实力雄厚,还具有一定的话语权。新文学壮大之后,通俗文学只能挣扎着生存。即便如此,通俗文学创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不仅出现了青史留名的作家,而且创作出大量经典作品,如社会言情小说大家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奇幻仙侠小说大家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等。“金梁合论事件”侧重的是香港殖民语境中以武侠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如何定位或书写的问题,并且通过两个武侠小说大师之间的过招得以说明。《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发表于1966年,此时的香港尚是英属殖民地,饱受离乱之苦的香港市民普遍具有浓厚的怀旧心态,而这甚至影响到新派武侠小说的书写方式。梁羽生指出:“我最初写武侠小说时用回目,用诗词作开篇,就是抓住南来香港的人怀念旧小说的特点,让他们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13]在当时香港社会的殖民语境之下,金庸、梁羽生武侠小说的书写风格不尽一样。初始之际,金庸的小说并没有似梁羽生的小说那么为主流所认可。梁羽生的

小说主题鲜明、立场坚定,受到《大公报》等主流媒体的青睐;外加影视媒体的改编,自是招揽了一大批读者。毋庸置疑,迎合时尚或者说占有话语权的一方,必定支配着大部分读者市场。金庸小说却不是那么成功,这便与金庸主持的《明报》和具有左翼色彩的《大公报》之间的多次论战存在一定关系。此外,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也存在多种困难,这也限制了金庸小说的广泛传播。导演徐克指出:“第一是它的人物很多,没法取舍;第二是故事复杂;第三是篇幅很长。”^[14]

有趣的是,无论是“双簧信事件”,还是“金梁合论事件”,都以一个匿名作为引发文学争论的导火索。“双簧信事件”是钱玄同化名的王敬轩,“金梁合论事件”是梁羽生化名的佟硕之。其实,无论是王敬轩,还是佟硕之,扮演的只是工具性角色,待发挥应有的作用之后,便退居幕后,而将幕后的操作者推到台前。有所不同的是,王敬轩是钱玄同化名的事实,很快就被胡适等所知,他们还表达了各自的态度。至于佟硕之是梁羽生化名的事实,却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傅国涌曾指出:“外界不知道‘佟硕之’是梁羽生的化名,《大公报》高层还是有少数人知道了,他们读了这篇‘合论’大为光火,指责梁羽生对金庸批评得不够,客气得过了头,有失立场,其中就有一起写《三剑楼随笔》的大公报副总编辑陈凡。”^[15]由此可见,自从写下《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之后,梁羽生便陷入了被人不断指责的漩涡之中。甚至在20多年之后,当罗孚将佟硕之是梁羽生的事实公之于众后,这种指责也并不少见,如倪匡便不无讥讽地说:“这是武侠小说者的笑柄,有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那是梁自己化了名写的,目的是拉金庸替自己增光,行为如此,是高是卑,自有公论。只要看是不是把梁的武侠小说和金的相提并论,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对武侠小说的功力是否深,万试万灵,金庸与梁羽生不能合论,绝不能。”^[16]

梁羽生是佟硕之笔名的秘密之所以隐藏了20多年,无非是他不想授人以柄,但《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仍把他裹进了争论的漩涡。有时候,历史总会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掩耳盗铃的又岂止是梁羽生?金庸也曾做过类似的事情。例如,金庸为了让读者相信在《明报》撰写“明窗小札”专栏的徐慧之实有其人,他甚至在《明辨是非,积极中立》一文的开头写道:“从昨天起,我正式加入明报编辑部工作,除了写这‘明窗小札’专栏,还协助金庸兄选择‘自由谈’的稿件……”^[17]按说“明窗小札”类似于一种杂文专栏的书写模块,似乎没有隐藏作者真实身份的的必要,但金庸仍以徐慧之出之。对于这种状

况,李以建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方面,他为了让外界读者不至于将‘徐慧之’等同于创作武侠小说的金庸,以致产生某种先入为主的想法,认为只是从事文艺创作的作家议论政局时事,特别强调‘明窗小札’是从‘徐慧之’角度来看世界,来评论世界。”“另一方面……他希望不要让外界造成一种误会,感觉到报纸的诸多栏目都是出于一个人之手,以显出报纸的多样化和知识观点的多元化。”^[17]

从“双簧信事件”中的王敬轩,到“金梁合论事件”中的佟硕之,再到“明窗小札”中的徐慧之,均一致采取了故意掩饰身份的匿名形式。这种做法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匿名作者想要借助匿名的身份进行代言式的表达,是在相异的历史语境之中隐藏于匿名背后的行为主体为了达到某种特殊目的而采取的策略。要么似王敬轩式的故意制造噱头引发舆论效果,要么似佟硕之式的抹不开老友的敦请,要么似徐慧之式的观察世界的又一种视角。值得注意的是,刘半农与梁羽生均采用了名不见经传的名字,而以往的书写却可能要借重某些大家或名家的名字,以期实现内心深处被刻意隐藏起来的现实欲望。可是,无论是笔名,还是化名,有时也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反讽效果,这种反讽效果甚至会激起一种超出文学范畴的紧张感或压迫感。比如,写下《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的杜荃,到底是不是郭沫若的问题,便一度陷入这种令人尴尬的处境之中。为长者尊者讳也罢,为文学史书写纠偏也罢,均足以让匿名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具体到假托王敬轩、佟硕之引发的两次文学争论,也是这种有意味的形式起了直接作用。尽管彼此目的不尽相同,但对于通俗文学或隐或显的论述,却又遥相呼应。

四、结语

从“双簧信事件”到“金梁合论事件”,再到如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通俗文学非但没有退出自身建构的话语场域,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合理性自证。范伯群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一书中指出,尽管通俗文学“不像‘文学革命’在提出后,紧接着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潮流的推波助澜,形成巨大的洪流”^[18],但历史的或然性并不总是一定的,它也有一套与自身相契合的叙事话语。例如,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的经典化过程,便是通俗文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最好表征形式之一。毕竟,通俗文学因自身内蕴的文本价值以及产生的社会效应,使其在号准市场脉搏、把握读者阅读趣味方面,仍具有一定的召唤力量。正如古龙所言“通俗文学的兴起,

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必然的事,因为读者有权选择自己喜爱的作品,他如选择了以阐扬忠义、针对邪恶为主的武侠小说,又何足以为怪?”^[19]至于这两次因匿名文章引发且相隔近半个世纪的文学争论,虽然已经成了一种历史实在,却又证明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通俗文学并不会因为人为地切割或辩难而退出历史舞台,在不同语境之中如何定位或书写通俗文学仍然值得进一步深思。再者,文学争论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之中,它不仅意味着争论双方的各执一词,而且成了一道折射历史沧桑的独特风景。

参考文献:

- [1] 汤哲声. 中国当代通俗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批评[J]. 学术月刊, 2009(12): 96-104.
- [2] 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82-83.
- [3] 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论选[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0: 230.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胡适往来书信选: 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4.
- [5] 张赣生. 民国通俗小说论稿[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1: 3.
- [6] 瞿秋白. 瞿秋白文选[M].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9: 140.
- [7] 孙燕燕. 武侠文学符号学: 20世纪中国武侠文本的虚构与叙述研究[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 87.
- [8] 陈平原.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 2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233.
- [9] 金庸. 金庸散文集[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6: 268.
- [10] 罗孚. 文苑缤纷[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 [11] 江堤. 金庸: 中国历史大势[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1.
- [12] 金庸, 池田大作. 探索一个灿烂的世纪: 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75.
- [13] 梁羽生, 杨健思. 武侠小说与通识教育: 在广西师范大学的演讲[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1): 140-143.
- [14] 刘海洋. 影像力: 一线导演、制片人对话录[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42.
- [15] 傅国涌. 金庸传[M]. 修订版.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172.
- [16] 徐庆全. 他们无时代[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 34.
- [17] 李以建. 金庸的功夫世人只识得一半[N]. 北京青年报, 2018-11-13(B05).
- [18] 范伯群.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4.
- [19] 古龙. 笑红尘[M]. 陈舜仪, 整理.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2: 113.

[责任编辑 于湘]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chapter titles with other three full English versions is made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stylistic layouts ,refining words and phrases ,euphemism ,allusion ,hoping to present Joly's translation style of the chapter titles more completely.

Key words: H. B. Joly; *Hong Lou Meng*; chapter titles; English translations

On the Literary Argument Triggered by Two Anonymous Articles: from the Event of the "Two-Man Action of Writing Letters" to the Event of "Review of JIN Yong and LIANG Yusheng" by WANG Zonghui P. 61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ise of the new literature of May 4th Movement ,it did not immediately take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literary world. At that time ,popular literature represented by the Mandarin Duck and Butterfly School was still the major.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and fight for the right of literary discourse ,the anonymous "Two-man Action of Writing Letters Event" emerged. After nearly half a century ,the anonymous event of "Review of JIN Yong and LIANG Yusheng" echoed the metaphorical theme of the former. From the background of the two literary arguments which took place in different context ,they seem to lack a common narrative discourse ,but they are just different in form and actually the essence is the same. The arguments still focus on how to define or write popular literature.

Key words: the two-man action of writing letters; review of JIN Yong and LANG Yusheng; popular literature; discourse right

Analysis Effectiveness on the Third "Three-year Action Plan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of Kindergarten Teacher Construction: Taking N District of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by XIE Mengxue ,DU Weiwei P. 75

Teacher construction is the key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data of kindergarten teacher construction in N district of Chongqing from 2016 to 2019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third "three-year action plan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in Chongqing from four aspects: teacher allocation ,team structure ,welfare treatment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It is found that the welfare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the teacher-child ratio both increas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eachers has also improved year by year ,and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has shown a good trend of development.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teachers in private kindergartens ,the serious loss of young teachers ,the low proportion of male teachers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ing needs of teachers' quality. It is suggested to support the private kindergarten teacher constructi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 action plan ,building a learning community of private and public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novating and introducing male education resources ,building a welfare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kindergarten teachers ,so as to guarantee kindergarten teachers to work with certificates from the system.

Key words: preschool education; action plan; kindergarten; teaching staff

On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to School Education: Research Progress ,Realistic Dilemma and Future Trend by TIAN Zhenhua ,LI Fangfang P. 97

School education is the main channel to cultivate and form socialist core valu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oot ,this paper carried on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by the literature statistics tool of Nvivo11.0. It is found that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tegrated into school education is constantly rich and expanding ,and it is also facing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insufficie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single acquisition mode of students. Therefore ,in the new era ,on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to school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xpand the scope and depth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integrate the education strategic methods ,innovate the education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and monitoring system. It is the deepening path and future trend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tegrated into school education.

Key words: socialist core values; school education; management concept; cultivation path